

中國傳媒研究、學術風格及其他¹

李金銓*、黃煜**

* 作者李金銓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E-mail: enclee@cityu.edu.hk。

** 作者黃煜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李金銓觀點：以歷史為經，以世界為緯。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

見樹又見林。要看到局部，又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規律和意義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結合的。見其大，又能見其小。主題要言不煩，提綱挈領，層次分明，因果嚴謹；但每個主題轉折多致，柳暗花明，意義豐富。

媒介與社會之間

黃煜：你如何進入傳媒研究的領域？

李金銓：我是1971年赴美國的，第一站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在宣偉伯（或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創立的傳播研究所唸碩士，重點放在媒介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上面。宣偉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撰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Schramm, 1964）是我的入門書，文字淺白易讀，非常吸引初學者。第二本書是勒納（Lerner, 1958）的《傳統社會的消逝》，後來又接觸到羅吉斯的《創新傳佈》（Rogers, 1962）。在夏威夷兩年，我幾乎遍讀了宣偉伯和羅吉斯的著作；後來又仔細閱讀卡茲（Elihu Katz）的文章。我無意中系統閱讀這幾個重要人物，對那個時候美國媒介研究的脈絡掌握就清楚了。

1950年代有過失敗的「統一科學」（unified science）運動，企圖建造一個統攝所有學科的科學；在這種氣氛下，宣偉伯認為每一個社會科學領域都得處理 communication 的問題，他在伊利諾大學成立全國第一所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時，敦聘各學科的專家（語言、心理、資訊工程等等）去任教，腦力激盪。後來恍然發現社會科學家只在

communication 這個十字路口路過，而不逗留。六十年代初，貝瑞森（Bernard Berelson）宣稱 communication 已經死亡！這是個諷刺的局面：一方面聲稱要建立居高臨下的統攝科學，一方面發現自己的學科原來如此邊緣。其後，傳播理論的路徑愈走愈窄。這個年輕的學科缺乏信心，在從其他社會科學吸取養料的時候，眩目於狹隘的（當時是新鮮的）科學實證主義，精力一味花在探討媒介對選舉和購物行為的影響，對於社會結構和媒介組織則置之不問，幾乎和早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所提出來比較大的社會問題脫節。Communication 在中文的泛義為「溝通」，狹義為「媒介」。第一代學者做的是狹義的研究，想的是泛義的宏圖。

我讀到英國媒介社會學者坦斯多（Tunstall, 1970）編的《媒介社會學》，序言提到二十多年來經驗研究的視野不出李普曼（Lippmann, 1922）出版的《民意》。嚇了我一跳，怎麼會這樣說？後來，我接觸出色的媒介學者，果然多半是對媒介有興趣的社會學家。傳統新聞、大眾傳播領域的理論資源太貧瘠了。我在密西根大學唸博士學位時，六成的課都圍繞著政治社會學轉，這是大學時代興趣的延長。這條路線形塑了我的品味和風格，從此以社會看媒介，而不拘泥在媒介看媒介。其後，陸續接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還有文化研究——英國式文化研究脫胎自文學批評，美國媒介研究則受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影響，兩者迥然異趣——媒介不只是文化意義的再現，也是日常生活鬥爭的場域。這就「去媒介化」了，不再是傳統的「媒介中心主義」；不僅從媒介看世界，還可以從政治經濟來看媒介。

不斷有人問傳播（媒介研究）是不是獨立的學科，只有邊緣學科才會有此焦慮。是學科也罷，不是學科也罷，多辯也沒有意思。現代社會不可能脫離媒介而存在，沒有人可以否定媒介研究的重要性，關鍵是能不能提出創新的研究議題，並賦予比較滿意的解答。因此，我覺得不必

太計較學科地位，學科地位是公認的，不是誰說是就是，或誰說不是就不是。

順帶一提，我早年讀到的美國現代化理論（以宣偉伯、勒納、羅吉斯為代表），在70年代末開始受到西方馬克思批判學派攻擊。兩派學術論戰引起我的興趣，我的博士論文後來出書（Lee, 1980），題目就叫做《傳播帝國主義再思考》，分析兩派的理路和證據。這本書是褒是貶，但二十多年後還有人拿來當課堂教材。我每年接到版稅時，雖寥寥之數，卻格外開心。

區域研究與理論建構

黃煜：1990年，你發表那本 *Voices of China*，是改革開放以後外國學界對中國傳媒的系統研究彙輯。從那以後，你和其他學者都保持一種清晰的思路，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建立主體性的軌道。你還出版了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1994)，*Power, Money, and Media* (2000)，還有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2003)，能不能圍繞你的選題談談主體性的建立？

李金銓：1989年我獲得一個偶然的機緣，開始組織學術會議，著眼於媒介研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一方面看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矛盾如何影響媒介的運作和內容，一方面探討美國媒介怎樣看中國。前一個主題貫穿以後四本書，牽涉媒介政治經濟學的辯論。

關於後一個主題，我要多說幾句話。記得1970年代初剛到美國讀書，中國的文革餘波盪漾，學府內許多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進步」師生，一方面憧憬中美建交，一方面從太平洋的彼岸像霧裏看花，對文革充滿了「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把「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

這些時髦口號信以為真，做了長篇大論的解釋。只要去中國轉一圈回來，就可以在校園昂首闊步。後來四人幫垮台，他們猛然發現原來的信仰都是「假、大、空」，有的從此消聲匿跡，有的深覺受惡質宣傳的欺騙，紛紛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沮喪。

美國學者和記者觀察中國，立場總是搖搖擺擺，從來就是在盲目樂觀和悲觀兩極之間徘徊，這既反映中國的現狀，又反映美國國內的現狀，更反映了中美關係的高低起伏。美國學者七十年代寫的文章很多是站不住腳的，當時消息極端封閉，他們拚命從《人民日報》的一言堂挖點材料，企圖建立理論的空中樓閣。美國反戰、女權、學生以及種族運動一時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不安。文革的象徵層面是「為人民服務」，現實層面則是流血鬥爭。美國學者、學生把國內的反抗氣氛投射到中國文革的象徵層面，直覺以為中國學生「造反有理」，為什麼美國學生不可以反抗建制？七十年代他們看到中國象徵的理想，看不到現實的壓迫，這種盲目的樂觀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完全改變，覺得共產黨的本質還是共產黨。八十年代中後期，又有很多美國學者、記者（特別是保守派）目睹中國的經濟改革，宣稱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等到1989年，又一次當頭棒喝——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在我編輯的 *Voices of China*（《中國的聲音》）中，著力於闡釋整個經濟改革對於媒介的影響，也看美國怎樣塑造中國的圖像。

第二本書也是延續原來的兩條理路走，書名叫做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中國的媒介，媒介的中國》）。當然，我從頭就希望促成科際間的對話，兩書作者包括媒介、政治、法律和歷史學者，可謂一脈相承，一氣呵成。

第三、第四本書理論建構的企圖更明顯。第三本叫做 *Power, Money, and Media*（《權力、錢、媒介》），其中例如潘忠黨和何舟，都在八十年

代從中國赴美留學有成，熟悉西方社會科學的語言，並試圖將現有理論（媒介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脈絡向前推進。第四本書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中國媒介，全球脈絡》）成形於本世紀之初，冷戰結束，全球共產主義的體制破產，進入所謂「全球化」的時代。碰上中國迫切希望和「全球」（是全球，還是美國？）接軌，在這個背景下媒介的角色是甚麼，全球力量和國內勢力又如何互動，便成了探討的主題。

前兩本的取徑比較接近傳統的「中國研究」，後兩本希望跟主流理論對話。做中國研究的人比較喜歡前兩本，對理論感興趣的人比較欣賞後兩本。我覺得區域研究和理論興趣好比古典音樂裡面的「對位緊張」（contrapuntal tension），寧可讓它們相互競爭互相協調，沒有必要用人為的力量勉強化解這種緊張狀態。例如我們研究中國記者日常生活的實踐，然後反顧西方學者的理論，看哪些視野和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個問題。中國記者的日常實踐為主，西方理論在這裏只是客。實踐的結果證實確實有對話的可能，我覺得這條路值得嘗試。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本？很難講，各個階段不同，但看得出理論企圖愈來愈強。

黃煜：1992年底，我在大英圖書館看到《中國的聲音》，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候這樣的書還太少，這本書有啓蒙的意義。你剛才提到，第三、第四本書理論企圖愈來愈明顯，能不能具體講一講？

李金銓：例如潘忠黨跟從美國社會學家塔克曼（Gaye Tuchman）以現象學研究媒介社會學的路徑，又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啓發，在北京等地做了大量田野訪問。他強調新聞實踐常常因「勢」（situation）而異，由於中國改革的勢頭曖昧混沌，反覆無常，記者往往無固定的常例可循，必須臨場想辦法應付局面，所以很不穩定，也沒有深思熟慮。（市場調查剛在中國出現時，當局批評這是向

資本主義靠攏，學者只能用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為市場調查提供合理化的基礎。）這種研究有很濃的文化特殊性，又有普遍理論的照明。

另外，何舟講政治經濟學，他分政治、經濟和政經混合等三個層面談《深圳特區報》，探討經濟改革對媒介的影響。他說，該報在政治控制的層面改變不多，在經濟靈活的層面改變很多；例如以前廣告的地位不重要，只從屬於新聞部門，現在則獨立作業，與新聞分庭抗禮，廣告並引發新聞作業的改變。他給政治經濟學注入新的內容。

還有，趙月枝從社會理論來探討媒介，例如她認為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劇國內階級分化，媒介話語為新興的中產階級服務，遺忘廣大的勞工和農民。傳統的學者可能會描述這種現象，但不會放在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架構裏面來看。放入政治經濟學的架構，更能照明具體的現象。

黃煜：區域研究者注重歷史情景和具體細節，理論研究更注重規律。哪一個更重要？

李金銓：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間的確是有些緊張狀態，但未必水火不容。美國以前社會學受結構功能論影響，不太談歷史，所關懷的只是現在。在歐洲，韋伯的起步就是歷史社會學的視野。歷史社會學在美國有復興的跡象，和其他視野也有匯流的趨向。我們必須在歷史的架構裏面看問題，即使不是做歷史研究，也要有點歷史眼光。以米爾斯（Mills, 1959）的話來說，一方面要以歷史為經，一方面要以世界為緯。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應該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而不是以中國的眼光看中國——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比較特殊性和普遍性。

「本土化」是虛假的口號？

研究生甲：台灣社會科學界首先樹起「本土化」的大旗，在三地都產生了一些影響。這個小圈子往往形成了一個學術霸權。在這裏面，一些徒子徒孫不斷繁殖，可能已經不具備或者不再願意與更大背景的學術進行交流，可以說是在「本土化」的偽飾下偏安一隅。

李金銓：你的憂慮是可貴的，但評價未必是公平的。學術是一個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態度當然應該開放而不封閉。社會科學看宇宙、看問題的方法都是自外引進的，不是中國文史哲傳統的一部分。建立一個主體性是需要，知識論裏也有這個空間讓你建立主體性，但並不是說西方的東西我們都不管——當然「西方」的概念也要解構。學術圈是一個社群，當然有權力關係，但你說的那些第一代並不封閉。台灣社會科學界追求「本土化」，有人在實證主義的範圍內添增很多本地的變項，有人反對實證主義，也有人主張「後實證主義」，還在多方摸索，不到下定論的時候。

研究生乙：你給我們一個場景、一個脈絡，從傳播學出發到社會科學，講了兩個主要的問題：一個是東西地域差異，投射到華人學術界的影響；另一個是宏觀與微觀二元對立對理論和方法論的影響。從社會學剛進入中國開始，從吳文藻、費孝通開始，「本土化」的問題就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從五十年代停止到八十年代復興，「本土化」的呼聲沒有那麼明顯了，直到台灣從心理學出發的這個「本土努力」……。

李金銓：我提到應該放棄區域研究的偏門，進入以區域為基地、有理論興趣的殿堂。中國人講「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從我們最切身關注的問題著手，並深入了解「西方」主流學術的視野，唯有這樣才可能對話和交流。建立主體性，不是排斥西學。以薩伊德（Edward W. Said）

爲例，他重新回頭看西方人對於中東的建構，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我們不是爲不一樣而不一樣，但有些問題對我們很重要，對所謂的主流來說可能隔靴搔癢。應當歡迎多元的解釋，互相爭鳴。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卑之無高論，做起來極難。「西方」理論翻新太快了，要進入它的理論精髓，談何容易？薩伊德受古典文學的訓練，然後結合葛蘭西（A. Gramsci）和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提出與兩個世紀以來英法學者對中東迥異的解釋。他遵循「西方」的遊戲規則，玩出不一樣的結果，等於向「西方」算總帳；他爲後殖民主義開啓了一條新河。我們甚麼時候才做得到？

我嘗試比較兩個政治經濟學在不同脈絡的解釋能力，在甲脈絡一個取徑可取，在乙脈絡另一個取徑可取，在丙脈絡兩個脈絡同時不安並存。很慚愧，我走得不夠遠。踏出第一步好難。我的世界觀不是黑白對立的：我接受陰陽思想，陰是陰，陽是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滲透。同樣，一個實證主義，一個詮釋主義，表面上衝突得厲害，我認爲還是有分有合，這個回頭再談。社會科學難有絕對是非，我常常將幾種說法排比來看，雖然我的工作還得更細緻。

歐洲思潮經過美國人的吸納，就穿插成爲多元光譜裏面的一點。英國的文化研究，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的結構學派——這些對美國媒介研究原來是另類的或對抗的，但傳入美國的土壤便和美國主流思想並列，批評的刀鋒磨平。美國吸納意識形態的力量太大了。對社會理論貢獻最大的，一個德國，一個法國，社會科學的傳統深厚。中國沒有這個建築概念體系的傳統。中國哲學崇尚人生的直覺智慧，如《論語》說：「壯年人戒之在鬥，老年人戒之在得」，說透了人生，訴諸本心，不必經過中間的文字障。（《韓非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類例子俯拾皆是。佛的最高境界根本是捻花微笑，不著文字。）西方式

的思維就會考慮多老才算老，「得」什麼，有幾種「得法」，在哪種情況下「得」，為什麼要戒「得」等等一連串的問題。可是今天我們講社會科學，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必須滲透到西方的推理系統和分析方式裡面去。有一位哲學家跟我說，早年曾經悲嘆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哲學，頗為自悲，年紀大了才發現原來這是兩個傳統、兩套標準，何必硬用「西方」作為衡量自己的標準？中國哲學家可以高呼：我們跟你們不一樣，彼此各有千秋，分庭抗禮！社會科學講不出這樣的話，因為本來不是我們傳統的東西嘛。你們別笑我盡講「入乎其中，出乎其外」這樣沒有學問的話，其實幾個人真能夠「入乎其內」，遑論「出乎其外」？

研究生甲：我們可以把社會理論分成三種：一種是像傅科、德里達（J. Derrida）那種：我坐在扶手椅上，吃進大量的理論，然後將它們吐出來，這是一種生產模式，很多時候是不能印證的，甚至不能稱之為「社會科學」；另一種生產模式是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從經驗研究提煉出理論來；再一種是經濟學裏面的社會理論生產模式，如納什（J. Nash），可能是純粹數學化的，然後推導，建立模型，再找材料驗證，與社會科學的歸納不一樣，是一種演繹的方式。我覺得你從專業研究著手，通向更廣闊的社會理論舞台。但是在通向這個舞台時，還要處理很多問題，就像你提到的，現象學和實證主義之間的溝通；在具體的學科上，你拒絕學科的「內眷化」（involution）……我們看到姿態，沒有明確的「該通向何處去」。

李金銓：你說的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評。「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不同。社會理論是對於整個理想社會的描述，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實踐主義。你所說的「實證」和「現象學」，是方法論，而非社會理論。進一步再細分，才到「社會學理論」，例如角色論和交易論。

講到宏大敘述，不是要人人講法國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革命。我低調、實際得很：我學米爾斯（Mills, 1959）《社會學的想像》，如果有自主選題的餘地，就盡量將個人興趣與公共議題聯繫起來，把困惑個人的問題——自由、饑餓或別的——普遍化成爲一個社會問題，讓研究連綴成一個體系，而非支離破碎的聯想。這樣做研究，總覺得有理想在召喚。每個人都得找定位，安頓個人的志業。我的位置不特別激進極端，也不是與世無爭；我從自由民主的基本關懷，探討問題背後的意義。我的東西不一定穿插自由民主這些話語，但背後的關懷還是隱然在支持研究的旨趣。

米爾斯受到實踐主義的影響，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他反對脫離社會實踐或無法驗證的大理論，也反對抽離社會脈絡的經驗研究，這在年輕歲月對我的影響很大。還有，我們講宏大敘述，是在受良好技術訓練的前提下談關懷。這牽涉到知識份子與專業學者的問題：在美國只有專業學者，公共知識份子的傳統很孱弱；歐洲許多名學者都是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傳統賦予士大夫泛道德的地位。今天社會多元複雜，虛矯的士大夫能不能肩負天下的責任？書沒有讀通，空喊以天下爲己任，不太好。我們扮演的「角色群」（role set）必須由近而遠，不稱職的學者徒喊「俯仰天地，悲天憫人」何用？社會賦予我們專業思想的權力，我們應以專業爲基礎，對某些社會問題有所澄清，有所貢獻。我們在公共領域發言，只能透過說服的過程讓別人相信，並不是我們在先驗上有特殊的話語權。最後的決定權在誰？我們是一介普通公民，權力不比別人大；我們的影響力來自專業所獲得的說服力量。葛蘭西說的「有機知識份子」，踏踏實實凝結成一個個社團，分散到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的重要領域，對公共政策能夠發言，促進公共辯論。

研究生乙：你提到另一條線索：宏觀與微觀。季登斯一直在爲兩者

勾連盡力。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對社會的看法不一樣。台灣學者葉啟政從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對社會對人的看法出發，試圖延續季登斯的工作、打通這兩者間的壁壘。這個企圖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實現？

李金銓：季登斯一直在嘗試，別人也在做，評價不一。社會與個人不是對立的，是一個negotiation的問題。這種書會繼續出現，最根本的問題往往是最難的問題。幾千年前就問什麼是「人生」，兩千年後還會問甚麼是「人生」。這是一塊試金石，想過這個問題的人跟沒想過的人視野和體驗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該想想這個問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答案。我們最好有些哲學素養，但不一定做哲學家。中國人有宏觀思考的習慣，美國人比較微觀，利弊互見。中國人爲學容易流於空疏，議論多，尙空談；漢學家學日文，因爲日本人的材料細。中國人有很好的、很空靈的見解，但我們直接訴諸於心的思維和「西方」推理不同。我們不要放棄傳統的宏觀視野，但從西方汲取邏輯思維的方式，尊重事實，尊重對材料的推理。關懷可以大一點，但每一小題都很嚴謹。

理論資源的「現代化」

研究生丙：我是做文學的。在文史哲方面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不像社會學的理论資源基本上來自西方。其實，現在做中國文史哲研究的術語，基本上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日本人翻譯，轉介到中國來的，很少直接用中國古代的術語。我做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也討論古代文學的理論和術語如何「現代化」。考古學在中國也沒有理論資源，但張光直教授依賴中國古代從地下發掘的材料，還有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材料，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與西方理論抗衡。你們講社會學，是不是將西方的理論拿來，再用中國的材料當成其註腳，還是從對中國事實材

料的分析得出理論，這些理論在什麼層次是創新的，可以和西方理論抗衡？

李金銓：你說的是 paradigm 的問題，我們的看法不謀而合。所謂 paradigm，是指學術社群用主流的典範解釋現象，但後來例外愈來愈多，不能再只當「例外」看，這時最有原創性的學者修正一些基本假設，看問題的方法就豁然更新了。社會科學沒有物理數學的典範那麼嚴格，但泛意的「典範」還是有的。基本假設是什麼？中國人辯論人性本善或本惡，也許無法經驗證明，但假設不同即發展出儒家和法家。張光直教授挑戰西方主流的典範，意義重大。余英時先生的方法與「韋伯式的」(Weberian)取徑暗合，他講要看內在理路，理論只是外緣，材料才是最後的審判。材料有內在理路，視野、方法、理論只是為了活絡思想，讓我們把問題說得更清楚。韋伯式的方法是先滲透到當地社會演員的「意義之網」，瞭解他們如何看待生活，研究者只從中援引理論概念(例如分工、階級)，幫助社會演員闡釋他們的意義。社會演員的詮釋是第一性，學者的詮釋是對社會演員詮釋的再詮釋，這是第二性。而且這些詮釋是多重多樣的。不像實證主義認為學者可以發現「一個」外在客觀的世界規律，只有第一性，無所謂第二性的問題。這裏有學術紀律與學術社群的約束，你的解釋必須經過別人的認可，否則無異於荒野的呼聲。

研究生丙：西方文化理路反抗自身的傳統，值得華人學習。特別是從事「後殖民主義」研究的一支，薩伊德及其弟子，其後那些女性主義學者，以及現在做文化批評的。我們為什麼不具備這樣的素質？西方很多理論我們不一定要成套拿來用，但有些精神是我們不可能擺脫的。

研究生甲：我覺得後殖民主義、女性研究等等，在美國的實證研究傳統裏面是不是受到尊重是值得懷疑的。他們的學術姿態助他們成為學

術名人，他們對實證研究的影響有限。一個社會理論家，雖然大家叫好，但沒有人把它運用到實踐中來，他的實際影響是甚麼？

李金銓：實證主義在美國還會是主流，但以實證主義衡量「非實證主義」甚至「反實證主義」的工作，未免有點霸道。所謂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後現代」不太可能取代「現代性」的社會理論，但有很多東西會被有選擇地吸收。

研究生甲：社會科學的成熟程度不一樣。經濟學很高，門檻明確。傳播學的形式化程度低一點，就可能受到「後現代化」理論的影響。

李金銓：純是「門檻」的問題嗎？現在經濟學以計量經濟學掛帥，是不談政治經濟學，不談價值問題的。如果關注「人」的價值問題，本質上能不能像經濟學那樣形式化？至少我覺得知識論和方法論不必定於一尊。

研究生丙：所謂西方的「現代性」，有人定義為「反對自身」，這個精神值得學習。第二點，很多西方學者研究漢學和中國問題，其實不是在研究中國，只是自身理論傳統的需要，用中國材料來反抗他認為西方存在的弊端。

李金銓：這個陷阱是存在的。有些人以己意套中國，套世界上任何地方。正如薩伊德所描述的英國法國「中東問題專家」，多是飽學之士，但潛意識裏就是有英法的思維立場，這是無可避免的。我們有我們盲點和包袱，在廬山裏不識廬山真面目。所以要提倡 discourse 或 dialogue：他們有他們的發言權，我們有我們的發言權，在半路相會，相互得到某種程度的理解。有一次在明尼蘇達大學聆聽著名的漢學家講儒家，他講完，有希臘教授起身問：「你講的我全聽懂，你是不是用我們懂的話來解釋孔子？這裏面有沒有危險呢？」漢學家回答說：「不用現代語言，你聽不懂孔子，但你聽得懂的西方語言和孔子必有落差。怎

麼辦？」其實精微處只能心領神會，不能完全靠語言表達，但如果反覆切磋，建立這種理解（understanding）不是全無可能。

學術紀律與社會脈絡

研究生甲：本土化是一個虛假的口號。應該進入到每一個領域裏面，社會科學是普世性的。不能說張光直是中國人，就給中國人掙得面子。不是的，應該把這個東西定位在學科的發展上面。任何一個範式的突破，不管誰來完成，都是學術共同體的進步，而不是說因為地域有了代言人，就有了看齊的模範。學術共同體的進步是沒有地域的。你作為社會學者所接觸的就是這套規範。

研究生丁：不對，這不是地域的問題，是意義的問題。數學沒有中國數學和西方數學之分，但是政治學、社會學有文化意義的差異。數學和物理學一定有明晰的規律，paradigm是成熟的。社會科學如果只重在揭示規律，可以稱之為「工匠」，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份子，研究的東西是很機械的，沒有品格，沒有特殊性。我們在知識生產時，有三個基本問題要解決，一是揭示規律，一是揭示意義，再有一個是變成行動。（我學政治學，去台灣訪問，接觸一些政治學者；他們從美國回來，有很大的激情，化為行動，對推動台灣民主化功不可沒。沒必要要求所有人都這麼做，但某些學科需要一些人這麼做。）不同學科也應該在一個多元的光譜中合力做某些事情。

研究生甲：遊戲規則是在學科內部制定的，與地域沒有關係。可能首先發明這套遊戲規則的是西方人，就像基督教是首先在西方發源的，但作為普世性的東西，它可能有地域的痕跡，卻不能以地區區分。第二點，你講到理論應該轉化成行動，我覺得這是學術和政治的區別。我們

到底是要做一個知識份子，還是要做一個政治的傳道士？

李金銓：尊重學科紀律，毋庸置疑。社會科學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華人的終極關懷總有跟西方人不同的地方。有些人不認同特殊的文化經驗，但另一些人或許覺得它很重要，事情只要不絕對化就無害。不是中國人就排斥西方。談主體性和本土化，不是排斥西方的學術。社會科學是西方傳來的，我們不可能排斥西方學術。學術是一個 public discourse，是一個 conversation，在整個公共領域裏不斷討論，而不是閉門造車。只有受過很好的訓練，要瞭解西方學術，才談建立自身的主體性。我們在選題方面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雖然解決問題方式和理論資源需要取自西方。西方理論來到本土一定要再造，不能全部照搬。普遍性與特殊性必須求取平衡。

研究生乙：我贊同。理論由概念和命題構成，概念來自於社會事實。各處的社會事實不同，甚至有巨大的差異……

李金銓：我在台灣生長，當年我們都投入社會參與，爭取民主。現在台灣的民主素質粗糙殘缺，但一個殘缺的民主比獨裁好！選舉對台灣人非常非常珍貴。美國人投票率低，原因分歧，有人認為選誰都是一丘之貉。後現代的人說，看，西方人對「大政治」——效忠國家、民族、政府、議會——那麼淡漠，只轉而關心「小政治」，即個人生活中抽稅、性別、族群等切身事。西方人有選舉權不用，這是一回事，我們有沒有這個權利，則是另一回事。這是脈絡的問題，也是意義的問題。

研究生丁：的確。季登斯說，我們有兩種政治，一種是解放政治，一種是生活政治。在中國，人們衝出街頭改變權力架構，爭取選舉權，這種意念已經給鄧小平南巡和市場經濟吹滅了，大家都關注小圈子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可能有政治內容，你可能討論某個領導人的笑話等等，裏面有話語和權力，但畢竟不同於解放政治。你剛剛講的非常對。

有一個次序的問題：西方人完成了架構的問題，像普特南研究「公民文化」，在中國是隔靴搔癢的。中國沒有公民文化，怎麼研究它的衰落呢？這是把馬車放到馬的前面去了。政治學研究經常說要「顛倒他們的邏輯」，我們自覺看到他們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不是他們的問題。強套一個理論，比工匠還不如。

李金銓：萬一「解放政治」不可能，只好覺得國家事不關己。人類永遠需要解放，只是不同的時間出現不同的問題。這裏面也許有階段性，西方經歷的也許若干年以後我們也會經歷，但這不是簡單複製的過程，有些地方一樣，有些地方不一樣，有些地方借鏡前人或其他社會的經驗。

主體性：結合規律與意義

黃煜：談一談規律與意義的結合吧。

李金銓：實證主義是近代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實證主義，用懷海德（A. N. Whitehead）的說法，就是「Seek simplicity, and distrust it」，有點類似胡適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宗旨企圖將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濃縮，然後化約到最重要的幾個變項或元素，並建立其間的因果關係，並且用最簡單最經濟的語言（尤其是數學公式）精緻準確地表達出來。自然科學追求準確和普世性，成就輝煌，社會科學亦步亦趨，針對社會現象建立理論的假設，尋找最重要的因果變項，建立關係和尋找結構，然後大膽懷疑之，試圖用邏輯和證據推翻假設。可是社會科學除了因果關係，還必須牽涉「意義」的問題，而意義是要主觀解釋的，而不是客觀的再現。意義多重多元多樣，要一層一層剝解，用現象學的話說就是「互為主觀」，主觀和客觀互相交融互相滲透。尤其受人類

學、史學、文學批評訓練的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會發覺很多東西不止是規律的問題，還涵蓋人文的意義。凱瑞（Carey, 1992）把懷海德的話變一下：「Seek complexity, and order it.」換言之，要把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層次分明地梳理並呈現出來。我覺得這兩個取向可以合在一起，既精簡道出內在規律，同時一層一層剝離外相，將內核顯現出來，意義之中有意義，大氣候下有小氣候，關照「部分」跟「全部」的關係何在。我喜歡韋伯的立場，規律和意義兼容並蓄，本身是妥協和共處（compromise）。

黃煜：在一個世界性的架構中對中國問題開展特殊性的研究，而不能強調特殊性本身的絕對性。不排除其他學科領域的介入。

李金銓：對，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態度。有一個教哲學的朋友說我是「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喜歡這種講法。任何事情把它放在一個語境中看，沒有絕對的是非。社會科學尤其「是非無實相」，昔日之「是」可能是今日之「非」，或者一地之「是」可能是另地之「非」。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看。我這麼講，無意將其絕對化。正如類似「民主」這樣的終極價值，我是不會把它相對化的；其他議題可以置諸脈絡，把各種說法當成假設，然後檢查在哪一種條件下哪一種講法更有道理。

台灣經歷近40年的戒嚴，馬克思主義那一套政治經濟學不能套用，因為情境不一樣。馬克思主義在西歐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邊緣戰鬥，批評資本無窮的、盲目的累積，扭曲人文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批判具有崇高而激進的人文理想。但台灣在戒嚴時期，私營報紙即使跟政府走得近，言論還是比黨政軍控制的報紙鬆動，市場的確有解放的力量。解嚴以後，台灣政治經濟關係重組，經濟邏輯慢慢取代政治邏輯，互動的形態和內容改變了，這時自由多元和激進馬克思兩個政治經

濟學的取徑並存，甚至糾纏在一起。我提出一正一反的命題，希望在更高層次發展「合」的命題。這樣一方面與政治經濟學有對話的可能，一方面確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華人社會的一些歷史現象。中港台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必須一層一層地剝出意義來。

沒有絕對的主觀，沒有絕對的客觀。我的世界觀受到八卦思想的影響：宇宙從第一個層次來看有陰有陽；第二個層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滲透；第三個層次陰尚可再分陰陽，陽也如此……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辯證性。社會科學的左左右右，看你站在哪裏，移步換景，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角度。如果把問題「絕對地」相對化，世界上似乎就沒有什麼價值值得保存了，學術變成一個遊戲而已！我篤信民主、自由、解放這些普世價值。「後現代」解構了許多全稱命題，甚佳。但普世價值必須不斷賦以新意，與時俱進，不要虛無地抹煞它。「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現在已經是人類共同的願望。

主題與變奏，形式與實質，結構與過程

李金銓：20多年前，我剛去明尼蘇達大學教書時，常跟學生講中國人「抽絲剝繭」的道理。因為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對竹有特殊的感情，乃以「剝筍」為喻，後來發現新大陸不出筍，改用洋蔥來說明，原來英文叫layering，正是此意。剝什麼？「剝」意義嘛。國人講「綱舉目張」：提出主題，完善細節。剛剛提到社會科學不單追求「規律」，也追求「意義」，兩者是可以結合的。

古典音樂有「主題與變奏」(themes and variations)的形式，主題清晰、變奏多端。變奏部分可以用各種手法加快、減慢主題，在主題裏面衍生另一個主題，變奏中還有變奏，從不同角度顯現這個主題。其中最

有名的莫過於巴赫 (J. S. Bach) 的 Goldberg Variations，居然動用了21種變奏詮釋主題。主題簡潔 (seek simplicity)、變奏繁富 (seek complexity)，在某種程度可以協調得宜的。另一種古典音樂的形式是奏鳴曲 (sonata)：先宣佈主題 (motif)，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的和諧與衝突；接著陳述曲子要表達甚麼；再用各種方式發展主題；最後重新敘述主題，將聽者帶回原位。主題不斷出現，提醒我們跑了野馬、盡情發揮還拉得回來。這個形式頗符合中國人作文的「起承轉合」。「起」是破題 (themes)，將規律交代清楚，「承」和「轉」從各角度正反鋪陳，淋漓盡致，發揮論旨 (argument)，最後「合」時下結論，首尾呼應。這樣見樹又見林。倘若只見樹不見林，無法得出總體印象，則局部壓倒全部；倘若見林不見樹，只有輪廓沒有細節，那是全部壓倒局部。要看到局部，又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這給我的啓示是甚麼？是規律和意義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結合的。我喜歡的社會科學著作，見其大，又能見其小。主題要言不煩，提綱挈領，層次分明，因果嚴謹；但每個主題轉折多致，柳暗花明，意義豐富。中國人喜歡「小題大做」，不喜歡「大題小做」，我覺得這兩點是可以合而為一的：也就是「大題大做」，題目想得大一點，但是每一個環節都做得仔仔細細，結構嚴謹，大題目分成許多小題目，絕不空疏。

薩伊德受「主題與變奏」的影響。他深受早期傅科 (分析 discourse) 和威廉姆斯 (R. Williams) 對霸權 (hegemony) 的解釋啓發，認為霸權是支配霸權 (dominant ideology)、另類霸權 (alternative ideology) 以及敵對霸權 (oppositional ideology) 不斷鬥爭的「過程」，而非「成品」。霸權在日常不斷的鬥爭中來顯現，有迫害就有反抗。薩伊德在《東方主義》(Said, 1978) 談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如何建構「東方」，服務文化霸權。《文化與帝國主義》(Said, 1993) 談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顛覆、抗拒

西方文化霸權，裏面從小說、從歌劇《阿依達》、從建築、從現代主義、從卡謬……主題清楚，但不斷從各種的角度呈現，讓你覺得意義複雜豐富、多元甚至矛盾。如果不是完全引喻失當，我覺得主題的「規律」和變奏的「意義」可以適度結合。

順道說，實證主義是一種形式主義，認為「形」本身可以包含「實」，用數學方式表達最精簡最完美。然而社會科學的意義與脈絡必須見其「實」，不能以形式一以貫之。從五四時代開始追求現代性，當時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在西方的脈絡位階一個是價值理性一個是工具理性，到了中國卻都是富國強兵的手段。既然不能富國強兵，民主這個手段當可棄之如敝屣：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國十個月歸來，從鼓吹民主變成鼓吹開明專制，他對美式民主失望，只見其「形」而未見其「實」。下一輩的胡適留學美國，深入美國生活方式（way of life），了解日常生活滲透的價值，不像梁啟超只是短期遊客，走馬看花，只看到制度上的弊端。胡適的形式主義成分比梁啟超少，對美國的理解更深入，畢生信奉美國式民主。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這些頂尖的留美博士，在抗戰時期責怪民主不能救國，紛紛回頭青睞開明專制：先倒日寇，再談民主。這些都是以形式主義來瞭解民主。民主是基本價值，不只是一種手段。中國不斷在辯論「全盤西化」能不能脫胎換骨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又是一種形式主義，根本忽略了脈絡的問題。一個文化怎能全盤移植到另一個文化脈絡？

在社會研究上面結合規律和意義，其實也是結合形式與實質，結合結構與過程，結合主題與變奏。如果只看結構，忽略過程，容易犯「形式主義的謬誤」。我覺得喬姆斯基（N. Chomsky）就重「形」多於重「實」。所有的激進觀點都容易抹煞其他觀點之間的差異，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差異微不足道。喬姆斯基直斥《紐約時報》為「官報」，說得那麼

絕對，美國新聞自由變成了虛假的，簡直和獨裁國家的喉舌媒介無異。因為形式掛帥，許勒（H. I. Schiller）才會提倡蘇聯、中國（文革時期）和古巴的黨國控制模式為第三世界抗禦帝國主義的利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眼光只放在過程，忽略結構，可能也提煉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見解。我的世界觀從來不是對立的。我服膺實證的精神，但以反對實證主義為檢驗一切的標準。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73）提倡「稠筆敘述」（thick description），細緻刻劃大中小各層次的文化意義，但他坦承只要離開「田野」（field）一遠，心裏就不舒坦。可見經驗研究者不一定要成為實證主義者。人類學推崇經驗研究，經驗研究可以一層層排比印證很複雜很多元的意義。

中國傳媒研究的初步藍圖

黃煜：你講到政治經濟學在中港台的社會歷史情境，希望發展出一套正反合的理論框架，可否談談？

李金銓：畫一個初步的圖像，分四個層次：一在最宏觀看政治經濟學；二在中間看媒介社會學，即媒介本身媒介機構的運作；第三個層次看文本（text），即媒介內容是什麼；第四個層次看脈絡（context），即解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從媒介獲得甚麼意義。

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經濟學，國際與國內互相交流。冷戰結束，全球化議題甚囂塵上。（I. Wallerstein認為全球化的過程五百年前就開始了，不過我們暫時以1990年前後為分野。）全球化對國內的政治經濟重組有甚麼影響？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採取阻擋外國媒介進來投資的防衛措施，例如組建媒介集團，而集團化勢必影響到媒介組織的具體運作。

接著談到媒介社會學，記者在這個競爭市場怎樣調配？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如何抗爭、協調、結合，也要「脈絡化」(contextualize)，必須做很多研究，進入記者的生活脈絡和意義系統裏面，瞭解他們是怎麼想的、做的。這方面的理論文獻相當精彩，但如何與中國的具體情境接通？

現在好的文本分析不多。媒介到底講什麼？我們應配合整個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法上的突破。我、陳韜文、潘忠黨和蘇鑰機 (Lee, Chan, Pan, & So, 2002) 結合媒介社會學和文本分析，探討八個國家記者如何建構香港回歸，也是一個嘗試。下一個是詮釋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的問題。文本本身不能產生意義，需要由人解釋。以中國現在的城鄉差異、階級對立，利益愈趨多元，不同的詮釋社群對媒介內容會有不同的解讀。這方面的研究很少。政治經濟學、媒介社會學、媒介文本、解釋社群賦予文本的意義，四個環節相扣相聯，也許卑之無高論，但至少能夠提供一個初步的架構。即使研究中國傳媒的社群不大，鬆散而不成形，但如果能夠建立文化自覺的共識也不錯。

黃煜：華人社會的傳媒研究，下一步那些方面比較重要？

李金銓：在全球化的脈絡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會走甚麼路，當然不是我們所能左右，但「共產資本主義」或「後共產資本主義」，以「共產主義」為名行「資本主義」為實的混合體，如何跟國際接軌？「國際」是甚麼？是單指美國嗎？接軌的目的何在？接軌以後對國內的政經環境和遊戲規則有何影響？權威政治會不會變形、變質，或者以新面目出現？在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之後，江澤民以降搞的是不是「新新權威主義」？

沿著政治經濟學的脈絡，我們看到組建媒介集團，即使現在只是長官意志的產物，卻建造出自己的邏輯，對媒介的經營、生態、話語產生

甚麼影響？我曾經把自由主義、黨內改革派和「新左派」放到中國的架構，解釋媒介生態的變化（Lee, 2000a）。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市場自由化是對權威政治的挑戰，還是權跟錢重新結合，還是兩者兼備？全球化帶來新的傳播科技，對整個行政管理產生甚麼影響？科技與意識形態不是楚河漢界，不能一刀兩割，將來的變化如何？在理論上，我覺得可以用全球化視野和「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論——中國依賴國際市場，不斷進行點（不是全面）的發展，造成國內貧富懸殊，階級對立激化——來看造成甚麼內在變化。

黃煜：可是中國大陸是一個轉型社會，變化的目的、意義都在非常不確定的情況下，一方面要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又要保持那種剛性的政治制度。您是說這兩種變化相互影響？

李金銓：中國一方面要和「國際接軌」，一方面又怕國內權力流失。這個鬥爭過程對媒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經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一個點（不是面）的發展。讓哪些人先富，在哪些地方先富？先富者的生活、消費形態和世界觀慢慢轉移，可能影響到整個階級關係的重組。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數目小而集中，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能在紐約或巴黎，而與國內「同胞」反而未必有共同的語言。國內條件和國外條件既是互動的過程，也是鬥爭的過程——哪邊壓力大，哪邊壓力小？國家如何處理國際資本壓力和國內工農的壓力，鬥爭的贏者和輸者壓力如何平衡，這些都與傳媒密切相關。

第二層次：媒介社會學。在這種政治經濟架構下，權力和資本如何結合？媒介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對抗權力結構的前提下謀取最大利益？宏觀的政治經濟影響媒介生態，如何改變主流媒介的記者對新聞的看法？現在講「貼近讀者」，合理化的基礎在哪裏？新聞話語與場域是

不是比以前大了些？目前中國書籍、網絡和雜誌的言論比較多元，報紙和電視的控制比較緊；電視新聞緊，娛樂節目鬆。從前台灣的邊緣媒介與主流裏應外合，有競爭，有聯合，在中國大陸如何？

中國政府積極發展網絡，背後是經濟邏輯掛帥。至於言論的管制，當局採用雙管齊下策略，一方面鼓動官方主要媒介上網，「佔據」空間；一方面只允許少數當局信任的人士經營門戶網站（portals）。

《人民日報》互聯網「強國論壇」有很多言論，假如搬上母報必屬禁區，中宣部為什麼容忍它的存在？（黃煜：《人民日報》不辦「強國論壇」，其他機構也會辦，與其讓別人辦，不如自己來辦，這也是一個策略。）「強國論壇」的尺度較寬，大概有幾個原因：（一）《人民日報》全國全民發行，政治權威高，而網絡儘管增長迅速，目前受眾只達人口的百分之六，多屬都市居民和知識階級，網絡還只是一個「小眾」媒介；（二）非官方的新浪網和搜狐網不許辦論壇，有話要講，只能上《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網站去；黨國不僅需要「瞭望台」，統一偵察輿論環境，防範未然，也需要給民意類似一個「出氣筒」，這樣其實便於當局管理和應對；（三）我想中宣部那些老派言論警察落伍，通常認為白紙黑字才是真理，他們未必了解小眾媒介和網絡的顛覆力量；（四）何況「強國論壇」內部有專人日夜監視，看到訊息或言論出軌，貼出幾秒鐘內即刻刪除。

黃煜：您剛才講媒介社會學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文本分析？

李金銓：中國以前沒有消費的概念，但一下子直接跳到「消費至上」的極端，這裏面階級對立出現了。「依賴性發展」所培養的世界觀、生活形態，是遠方巴黎、好萊塢的「替代式參與」。以滿足這種需求為宗旨的媒介如何推波助瀾？（我現在只是舉例，不可能太詳盡，但大方向

就是看媒介如何適應日常生態的變化而產生一系列新條件。)更進一步,媒介到底講了什麼?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分析內容。消費、階級、黨……這些詞意起了變化。我們的研究遠遠不夠。北京的報紙各有權力靠山,風格相對多元;南方得風氣之先,比較開放大膽;上海靠的長官意志,弄得中國金融中心的報紙這麼死氣沉沉。春江水暖鴨先知,中國的變化單看這三個城市不夠,但知過半矣。

黃煜:中國現在的主流媒介主要有三套話語:一套是官方話語,官方話語也「與時俱進」,十年前談建立市場經濟,十年後談與國際接軌;第二套是小資情調中產化的媒介,主要體現在非政治的金融、商業方面,現在勢頭強勁,是媒介牟利的巨大來源;第三種是平民話語,強調煽情和市場路線,較接近平民。這三個話語體系並存。自由派的立場主導了很多新聞工作者,譬如胡舒立;還有,新左派和民族主義影響力較大,因為他們站在捍衛國家利益的角度,又把西方的一些後學激進「反全球化」的理論混合在一起。中間是一些技術官僚,專業主義型的,基本上不參與論爭。在「全球化」的整體格局裏面,中國傳媒的變化在深度與廣度上延伸。

李金銓:政治經濟環境帶來社會分化的過程。潘忠黨與陸擘(Pan & Lu, 2003)的研究顯示,有些記者談到「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典型儒家知識份子的承擔;也有人談到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也有人提到受眾和讀者,意識到了市場邏輯和媒介專業意識。我的觀察是:大部分記者「先富起來」了,是既得利益分子的一部分,所以安於現狀——市場化的確綁架了政治改革的熱情——而少數理想主義分子,中年一輩的理論資源來自共產主義,青年一輩則嚮往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雖然他們對西方的新聞實踐通常只是一知半解。這樣概括全面嗎?

英國文化研究先驅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提出三個概念,如果

用來看中國傳媒現象的種種變化，也饒有深刻的意義：（一）支配性的結構（dominant structure），言論喉舌內有黨國支持，外和其他勢力既聯盟又競爭，競爭有明有暗；（二）剩餘結構（residual structure），例如儒家知識份子的情結還在起作用，再反儒家的人都受儒家的影響，何況儒家與共產黨的意理都是政教合一的體系，共產黨怎麼「反儒」都無法全面消滅儒家的積極性或抹煞它的消極性；以及（三）新興結構（emergent structure），目前就是市場因素的介入，驅動媒介去迎合有錢有閑階級，於是貼近平民的報紙（如《華西都市報》、《北京青年報》）和貼近大都市消閒階級的報紙（如《精品購物指南》、《申江服務導報》）應運而生。威廉姆斯說要看三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一）支配性意識形態；（二）另類的意識形態，並不反對主流，但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解釋，這在今天的中國愈來愈多了；以及（三）敵對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目前難以存在。我們觀察主流的支配意識形態如何吸納另類的意識形態，如何攻擊、削弱另類的意識形態，給它貼「修正主義」的標籤。邊緣媒介對主流有沒有抗拒、顛覆，有沒有口是心非？威廉姆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架構。

我們的研究偏向印刷媒介——對海外學者，印刷媒介較容易獲得——而忽略了廣播電視。廣播電視是流行文化最主要的載體。要瞭解消費文化的興起，首先還是要瞭解流行文化，這一方面我們做得不夠。另一方面，我們的眼光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外加幾個零星都市，瞭解不夠全面。華人學術社群需要一種學術自覺，即使國內國外學者在心理上能有鬆懈的分工合作，也是很有意義的。

受眾因為利益的分化，興趣與利益結合，形成一種凝聚力，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個人的興趣與群體的興趣不斷分殊。他們如何吸收、解釋媒介的話語，媒介組織如何瞭解受眾需要？上述四個環節不斷互動，

持續思考會為我們提供新的空間。總而言之，最重要的還是在中國媒介與現代性的關係：媒介在這個政經脈絡下發展，對於自由、平等、民主有什麼意義？如果大家這麼思考，整個研究社群當可建立旗幟鮮明的主體性。

黃煜：1998年以後，中國受西方影響的「新左派」提出，中國倘若按目前的方向走下去，就是西方全球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他們旗幟鮮明，反對這樣一種現代化。的確，怎麼樣的現代化，在大陸思想界產生了有趣的爭論。

李金銓：以前不太可能討論這個問題。新左派的精神和語境，我是懷有同情的，但將西方最激進的話語放到中國的脈絡是否完全恰當？哈貝馬斯（J. Habermas）到中國訪問，對於中國新左派急於引用他的左派論述，以建立自己反帝的立場，卻反而容忍專制政權，言下頗不以為然。我覺得他們比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提出的反封反帝的「雙反政策」還退步。（毛專權以後只「反帝」不「反封」，或以「封建」的罪名整肅政敵——他自己是最大的封建幫主，這是另話。）自由派現在希望以「國際」抗衡「國內」專制政府，熱衷「反封」多於「反帝」。

我認為這兩派是一個悖論，不是誰對誰非——可能兩個都對，但對的理由不同。但我不是和稀泥的折衷主義者，而是傾向於看在哪一個脈絡底下哪一個講法比較有道理。我對自由派反專制統治，和對新左派反對在全球化以後因政治經濟霸權衍生的文化霸權，都有深刻的同情。但在理論上，最激進的後學搬到中國，我倒是有一點保留。反對「現代化」，和反對「現代化理論」，這是兩回事；正如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也可以反對「反對帝國主義」的某一種理論。新左派提高人們對於全球結構宰制力量的警覺，但完全嫁禍於國際資本主義，而不將國內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提上合理的討論層次，這是有問題的。

黃煜：英國和美國的文化應該有一貫脈絡，但是知識份子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分野很厲害。

李金銓：我看不必「在先驗上」像唐吉珂德般反對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架構，不是你要它走掉就會走掉。問題是選擇哪一種資本主義，當然各國選擇的能力不同。中國將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架構中，卻長期與歐美隔絕，現在接軌只怕得到封閉的壞處，沒有得到隔離的好處。歐美不可能吞噬中國，中國也不可能吞噬歐美，問題是如何互相滲透，取精用弘。當然，很多事不是自己主觀解決得了的，但如果知道要什麼，在主客觀權衡中也比較知所選擇。全球化不止是華爾街、好萊塢的宰制，也是人權問題國際化、對抗恐怖暴力，保護環境，真的一無是處嗎？全球化既「分」（如巴爾幹半島）也「合」（如歐洲聯盟），很複雜。

新左派各抒己見，就是蒙中國「開放」的好處，其憑藉的理據更是歐美最新潮的激進「反現代化」或「反全球化」思想。全球化不應該只有一個權力中心說了算。自由派提到全球化提高中國的透明度，讓中國接受國際的規範——在某個程度，我同意。這次的SARS危機，倘非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施加壓力，情況不知會有多糟。從前閉關自守，當局幾乎滴水不漏地封鎖唐山大地震的消息，現在門戶打開了，卻無法封鎖SARS的消息。時代不同了，全球各地的命運緊綁在一起，何況中國渴望國際社群伸出手歡迎它。中國當局起初一味隱瞞SARS的疫情，為的是牽涉到民族「面子」、經濟利益和個人官位。後來公開疫情，怕的是世衛組織宣佈中國為疫區以致於打擊投資和旅遊，著眼點不在人命，而是在錢。這個傳染病關係全世界共同安全和福祉，不許中國自己關起門來撒謊。這個外在的壓力，我看是好事，不是壞事。

註釋

- 1 本文由兩段因緣組成。第一段《視點與溝通：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稿成，徵求意見於香港城市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跨科系，凡十餘人；他們建議開個座談會，我以為不拘形式隨便聊聊，想不到後生可畏，居然有備而來，而且砲聲隆隆。該文後刊載於《新聞學研究》（2003年10月，77期，1-21頁）。第二段則是與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黃煜博士平等對談，問題轉趨深沉。兩次錄音合由石琳整理，以誌兩段香港因緣，並列為拙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附錄，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參考書目

- Carey, J.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 Lee, Chin-Chuan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Lee, Chin-Chuan, Chan, Joseph Man, Pan, Zhongdang, & So, Clement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Chin-Chuan (Ed.). (2000).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2000a).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4), 559-576.
- Lee, Chin-Chuan (Ed.).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Lee, Chin-Chuan (Ed.). (1990). *The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hin-Chuan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 Free Press.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n, Zhongdang & Lu, Ye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215-236).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Rogers, E. M. (1962).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Schramm, W.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nstall, J. (Ed.). (1970).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Chinese Media Studies, Academic Taste, Etcetera

Chin-Chuan Lee and Yu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vers several main topics: (a)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and society; (b)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ese media studies as part of area studies and Chinese media studies as part of theory building; (c) indige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studies,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emingly conflicting academic paradigms and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d) a rough outline of problematics and projects for Chinese media studi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wo academic conversations: the first between Lee and score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second between Lee and Huang. Lee is Chair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u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eywords: Chinese studies, media and society, area studies, indigenization, academic paradigms